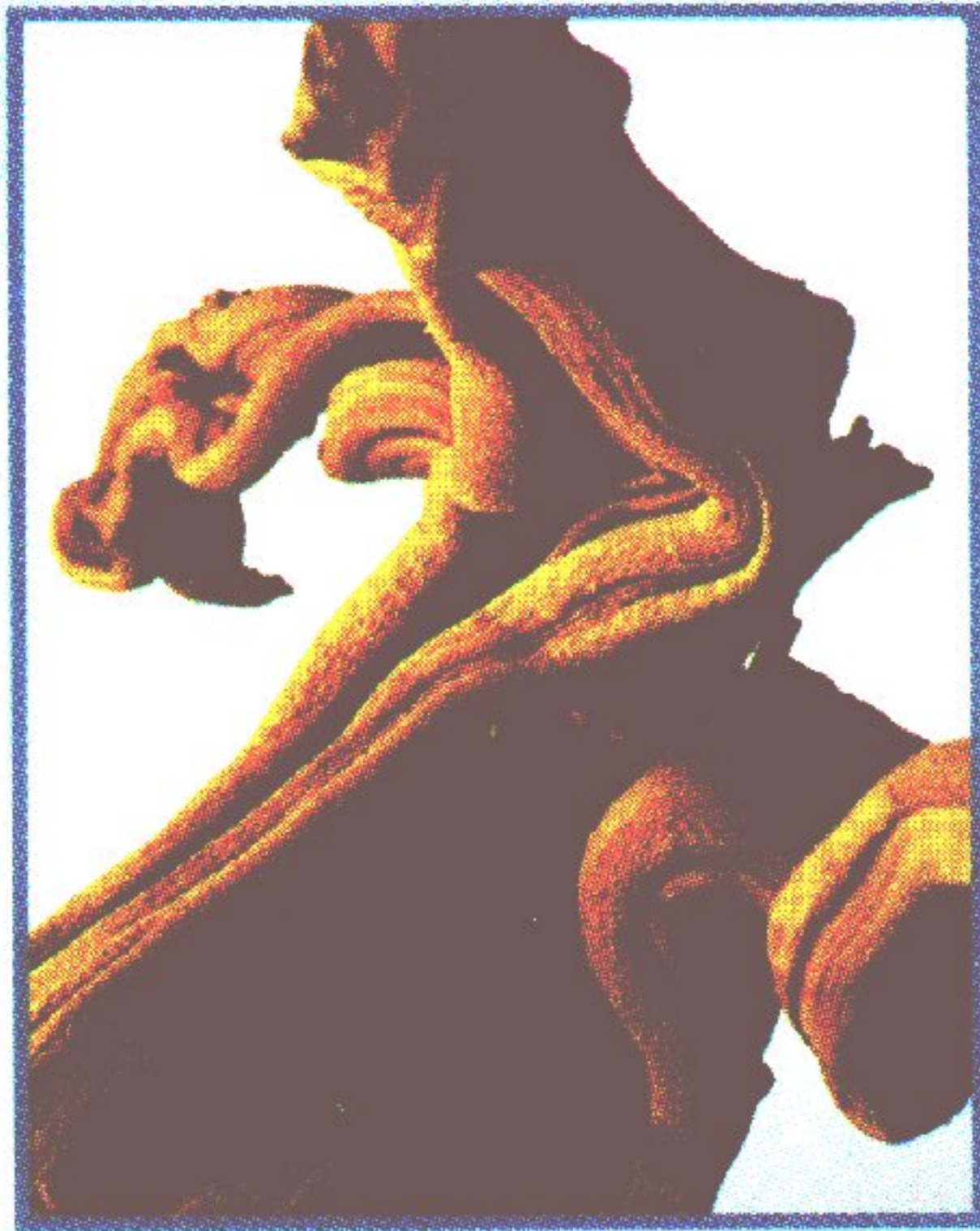


天涯文论丛书



THE MODERNITY
AND
THE DISCONTENT

现代性及其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张德明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THE MODERNITY
AND
THE DISCONTENT

现代性及其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张德明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 张德明
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3

(天涯文论丛书)

ISBN 978-7-227-03439-1

I. 现…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0754号

现代性及其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张德明 著

责任编辑 景 岚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市飞马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240千

印 数 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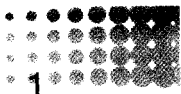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439-1/I·897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天涯文论丛书”是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新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几年前,我学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文艺学多棱镜丛书”,在全国产生了较好影响。经过多年努力,一批教授、博士的新著相继完成,考虑到老师们多年来付出的心血,我们决定推出这批成果。本丛书原计划出版七本,但由于各书完成时间前后不一,所以其中部分著作已在学科支持下通过其他途径面世。

本丛书冠以“天涯”之名,主要源于该词在地理、文化上的狭义而非广义,这里指的是以湛江所在雷州半岛和在地理文化上与之具有密切关系的海南岛为主体的中国大陆最南端地区(属于古人所说的“海国”范畴)或南部粤语文化圈。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向来不是一种封闭型的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红土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一种具有较强包容性和混杂性的文化。该地区的语言状况非常复杂,是一个由闽、粤和客家等多种方言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复杂的语言系统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历史发展、族群迁徙、文化杂交和人文积淀的结果,折射出两千年间中国地域文化的关系史。随着秦、汉、元兵的南进和元末明初战乱的爆发,闽越一带的老百姓、西江一带讲粤语的居民、福建汀州府及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纷纷南逃或南迁至雷州半岛、海南岛,致使



现代性

及其不满

其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该地区的文化具有迁徙文化的成色。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该地区也有构建外向型文化的条件,这既是湛江能够成为我国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的原因,也是1898年法国政府以租借广州湾为名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湛江和海口为主体的南海北岸地区实际上是当地俚僚文化、中原文化、闽语和客家文化及殖民地文化的杂混之所。

由于地处天涯,中国陆地最南端地区也是处罚逆子贰臣和天生具有反骨的知识分子的好地方。该地居民原以百越族为主,其文化生态属于原始的俚僚文化,且人迹罕至,有南蛮之地的称谓,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人士一般不来此地,除非被朝廷流放。史载,唐宋以来被贬谪到湛江或在湛江逗留的名人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和大文豪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不得志者流亡至此,从雷州罗湖的水波中依稀领略到文化中心杭州西湖的美姿(苏轼有诗句“万里宦游来海国,一般乡景忆杭州”),所题楹联和留下诗词、墨迹无数。我们认为,从该地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出发,中心和边缘、中原与南蛮、国内与国外、陆地与海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均能够方便地收入眼底,进入流放者的反思空间。我辈均从北方迁徙而来,是苏轼等流放者衣钵的继承者,今日重蹈古代流放者的足迹,除了与古人神交,体会此地文化的独特与混杂,从某种程度上还肩负着文化探询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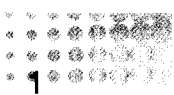
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在探询该地区文化的特质,而是秉承天涯文化所蕴涵的流亡、反思和追求开放性、混杂性的基本精神,通过怀疑现有的成见,融合不同的视界,和立足于文化和地理的边缘,探究国内外文学文化的意义及其互动逻辑。本丛书的主旋律是与来自中西不同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展开对话,思考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动态关系,同时思考文学性得以发生的

符号学机制。王钦峰教授的《福楼拜与现代思想》通过悬置欧美学者持续使用的各种传统和现代的批评模式，把福楼拜独有的思想体系放在与现代主流思想、现代文化及其所凝聚的现代性价值观、西方理性主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中去研究，得出了福楼拜是一个科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反对者及现代文明的挑战者的结论。王阳教授的《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中外文学文本的叙述符号分析》是对他四年前《小说艺术形式分析》所提出的叙事学理论的发展，该书在与国内外叙事理论的潜对话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符号学思想，探讨了文本意义结构的形式规则，从多个侧面对文学文本的符号结构、文本内外诸种可能世界的主体、意义及关系进行了描述。赵金钟教授的《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不仅探讨了中国新诗在取代旧体诗而在文坛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在语言、结构方式等方面所形成的新的审美特征，还探讨了民间性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持续存在的基本规律，为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国新文学的特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张德明博士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则从宏观上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张力结构的存在，指出这种张力结构的形成是由西方文学理念的中国移植和中国本土经验的现代转换的冲突性选择所导致的，从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些探讨为转型期的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界。

最后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他们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的鼓励也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增加了信心。

王钦峰

2006年12月



现代性话语：机遇还是陷阱（代序）

我觉得，替人作序是一件离我相当遥远的事情，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名震天下的大师才有资格对人家的文字指点江山，“好为人序”与“好为人师”一样都是我自己现在必须警惕的东西。然而，张德明先生却有他的执著与认真，他坚持让我为他的论著写点什么。我们有过一段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交流史”，也都做过“现代性”的题目。这样我就无法推辞了。

在这个时候，我其实对张德明先生是怀着敬意的，因为他似乎明白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可能性与有效性，我们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观点，要直接从我这里获得赞扬和吹捧并不容易，然而，当我直率地道出我的顾虑时，他竟毫不在意，一再申明这仅仅是希望能够进行学术的对话与交流。这反倒让我心生愧疚！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现代性”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的，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将“现代化”、“走向世界”之类的用语认作是1980年代的关键词，而“现代性”则自然属于1990年代以后的新宠。我曾经借用目前收录最丰富、检索也最方便的中国期刊网CNKI对1979年以后中国学术论文上的一些关键词作数理统计，统计表明，从1979年到1987年整整九年中，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论文中没有出现过一篇以“现代性”为题目的文章，1988年出现了

序



现

代

性

其
不
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两篇,但很快又消失了。(就是1988年的两篇论文其实也与1993年以后的“现代性”论题含义根本不同)真正开始对“现代性”概念的追问大概得从1993、1994年的一些论文算起,这些论文的代表作包括张颐武的《对“现代性”的追问——90年代文学的一个趋向》(《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4期)、《现代性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3期)、《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90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4期),韩毓海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学术月刊》1994年6期),韩毓海与李旭渊的《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痛苦与毛泽东思想的双重含义——兼说中国当代文学》(《战略与管理》1994年5期),汪暉的《传统与现代性》(《学术月刊》1994年6期),彭定安的《20世纪中国文学:寻找和创造现代性》(《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5期),文征的《后现代性与当代社会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2期),赵敦华的《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循环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4期)等。

对概念的提炼和重视反映的是一种学术目标的自觉。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随着1993年以后中国学者对“现代性”话题的越来越多的关注,“现代性”理念作为重点阐述的对象或立论的主要依托才逐渐堂皇地进入学术文本,构成其中的关键词语,大约在1995年以后开始“傲然挺立”起来。21世纪以后,无论是作为论题还是语汇的“现代性”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对西方文化意义的“现代性”含义的追溯和“考古”业已成为了我们的学术“习惯”,同时,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包括古代与现代)所进行的“现代性阐释”更是层出不穷,几近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语汇。至此,“现代性批评话语”似乎真的正在实现着对于1980年代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置换。

问题在于,这样的置换究竟对中国当代学术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我们学术发展的一次机遇。早在1994年,在“现代性”话题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学者迅捷地宣布: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被肯定的概念。它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

“而在这种对‘新时期’话语的超越和逆反中，对‘现代性’的追问业已成为‘后新时期’文化的最重要的潮流之一。‘现代性’在汉语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种位置？‘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激情和诗意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语言的？我们如何跨出‘现代性’的门槛？这些问题突然被置于90年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中心，被众多的本文所书写，它已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现象，成为我们探索‘后新时期’文化特性的重要方面。”

这是在“告别现代性”、“质疑现代性”的意义上强调“现代性”的讨论学术意义。另外的学者则从寻找学理的深刻出发区分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根本差异，据称这样一来，我们将有效地超越1980年代以至“五四”以来的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系列模糊认识，在一个更加复杂而丰富的语境中来读解历史的真实：

“五四”的一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却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算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不同。”

“第一个问题便是所谓‘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不同。”

“作为一个迟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痛苦的‘现代性’经验，实际上，‘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几乎从人文上把人类统一起来。但这却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没有统一性的统一，一个充满斗争与矛盾，充满焦虑的统一，它许诺了‘创造历史’的原动力，但亦如郑敏先生所说，也产生了王起明式的充满暴力、欲望和乌托邦思想的破坏性力量，‘五四’完成了中国的现代性文化理论，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依然在艰难中行进，中国人对于处在此一进程中的自我的审视才刚刚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思考亦有待深入和丰富，值此‘五



现代性

其不满

其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四’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一个泛化的、抽象的和完成式的‘现代性’,与此岸的、正在行进的和有待丰富的现代化进程加以区分,应该是必要的。”

这自然也是为我们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然而,综合观察 1990 年代以降的这些“现代性批评话语”,我们读到的却不仅仅是令人鼓舞的学术“机遇”,就像“现代性”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一样,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运用也十分的复杂,韩毓海先生所期待的那种超越“五四”式的“泛化”与“化约”的目标似乎远未实现,仅从以上我们所征引的两段文字来说,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们各自学术思路的重要差异:一个是对“现代性”意义的“终结”,一个却是在还原历史复杂性当中的进一步认识与开掘。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1990 年代以降的中国学界,究竟在“现代性批评话语”中获得了什么?是赢得了机遇,还是落入了陷阱?要么就是两者兼有。

张德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当属于我所谓的从学理出发寻找解释现代中国文学的合理模式的努力,我觉得,他的工作就如同他的为人一样,是严肃认真的,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分析,这些东西都推动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它给我的启发而言,显然体现了我们当前文学研究的“机遇”,不过,我也同样想到,就如同“现代性”这一概念和批评方式今天带给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复杂影响一样,每一次学术的机遇本身就可能形成前进的陷阱,如果我们能够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可能也是一位当代学人的必要素质。

愿我和这本著作的广大读者一起,共同分享张德明先生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学术真诚,同时,对我们应该警戒的部分有所警戒吧!

李 怡

2006 年 10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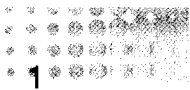


目录

MULU

绪论 现代性:反思与重构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	11
第一节 “现代性”话语分析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再 阐释	11
第二节 “重写文学史”:一个没有终结的现代命题	29
第三节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47
第四节 文学现代性追求与儒家思想传统	62
第二章 近现代文论与现代性	74
第一节 梁启超、王国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导引	74
第二节 《新青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的构建	87

第三节 《学衡》《甲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 逆向促动	100
第三章 新旧诗与现代性	117
第一节 旧体诗: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会通	117
第二节 郭沫若诗歌的现代性	133
第三节 李金发诗歌:异域生存理解与新诗现代性 创构	138
第四节 闻一多诗学:现代性追求中的矛盾与困窘	158
第四章 通俗文学与现代性	183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的曲折遭际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理解的历史变迁	183
第二节 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199
参考书目	212
后记	221



绪论 现代性:反思与重构

一

思考中国文化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作出爬梳、理析和辩驳,这在中国学术界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却有着言说不尽、弥久常新的学术魅惑,因为从过去来说,20世纪的学术思想“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问题是现代现象”,就将来而言,“在未来的世纪,学术思想仍将因现代幽灵的纠缠而费神”^①。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历史时代视野和学科设置合法性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不免存有不少混沌、盲点和误区,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理清,有待我们作更细致的分析和更理性的判断。因此,我们觉得,如果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以此为起点,通过对文学事实的客观考察,进而对现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进行重构,仍然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从重塑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框架,这是“重写文学史”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但对文学研究来说,它的学术意义是长期性的,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指标,它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因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言》,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現

代

性

◆

其不满

—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此,仍将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时间里一直引领着(指导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写文学史?文学史重写还有什么可能?或者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著述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只有现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书写还存在问题,才可能赋予我们的文学史重写与重构以历史的合法性。然而,对文学史的反思、批判和重构,又并非是一种可以随意为之的事情,它最初可能起因于我们对一些固有的文学观念的质疑、对现行的文学史教材的不满,而我们所有关于文学史的反思和重估,只有建立在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确切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显得更合理和更有说服力。从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相应地,对文学史的反思和批判也走过了近百年的时光。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和困惑,依然有许多的矛盾尚待解决,依然不断在产生着伴随时代前行而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时,他们的主要意图在于擦拭掉粘附在文学身上那层厚厚的政治尘埃,还文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推进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正常有序、健康稳定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事文学史研究多年的钱理群教授在回顾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历程时,归结出的不是自己如何如何成功的经验,而是一大堆的“矛盾与困惑”,这些矛盾与困惑,用钱先生的话说就是“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和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

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等等”^①。钱先生所谈到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说明了目前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地方亟待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现今和往后的文学史重写提供了许多新的线索。

检视建国以来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是不不少的，包括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党的文艺政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阐释和定位，都存在许多欠妥的地方，没有哪一项令人满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上述欠妥之处，通过学者们的大胆探究，正在逐步理清，但拨乱反正得还不彻底，而且旧有的某种思想倾向一旦形成，往往会顽固地盘旋在人们的思维空间，驱之不散。比如一直以来，文学史的座次排列万变不离“鲁郭茅巴老曹”，这种由文学史的政治化写作带来的政治性排序，阻碍了我们对另外许多优秀作家的审美观照，而且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举例来说，创作了《大波》《死水微澜》等作品的小说家李劫人，其艺术成就就很高，在20世纪30~40年代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曹聚仁先生曾经说过：“其实，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之中，李劫人的几种长篇小说，其成就还在茅盾、巴金之上。”^②曹聚仁的这一评价，与我们现今文学史教材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至少来说，我们现存的文学史对茅盾和巴金作了大书特书，很少讲到李劫人。当然，话说回来，我们并非一定要求文学史把李劫人描述为创作成就如何超越了茅盾和巴金的大师，所谓“过犹不及”，任何偏向哪一极的做法都是对学术严肃性的一种消磨；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给

①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51页。



现

代

性
及其
不满

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

这个作家以相当的关注,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家对李劫人的重视和研究至今都比较薄弱。其他很多优秀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恨水等,很长时间以来,要么一直处于文学史叙述的边缘地位,要么就干脆被排挤在文学史的描述之外。我们现在都知道,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但他们得到文学史家的认可、进入文学史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而此前大陆学者写作的文学史中,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长期都不在叙述之列,直到海外学者如夏志清等人的文学史著作被引入大陆后,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些优秀作家迟迟不能纳入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之中,其原因何在呢?我认为,除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原因之外,恐怕或多或少也跟我们旧有的文学史观、跟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等有关。沈从文说他的小说《边城》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①,但他在讴歌乡土上淳朴静美的人性和感人至深的原始生命力时,也从侧面对戕害人性的“现代文明”作了批判和鞭挞。很显然,沈从文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与中国社会不遗余力地追求现代化的节拍并不是那么吻合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精神也不谐调。这样,沈从文被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历史叙述价值依据的文学史著作长期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张爱玲曾把她的小说称作“新传奇”,“传奇”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学样式,张爱玲对自己小说的这一命名很容易使人想到她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正如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不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叙述笔调,都给人新奇、奇异和奇幻之感,小说的故事往往“用新的文字结构来描写,也渗用了一些通俗小说传统技法”^②,有着唐传奇和明传奇的美学神韵。由此可见,张爱玲的艺术理想,与极力倡导的“推倒旧文学”的新文

①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范烟柳:《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版,第271页。

学运动有着较大距离。再比如鲁迅,以往一些文学史家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个彻底的反对传统文化的战士,其实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鲁迅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微妙的、复杂的,存在着相当紧张的关系。鲁迅的确曾劝青少年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但他一生又不知疲倦地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进行着研究和阐发,写下了彪炳后世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这一行动,可以看作他对传统文化明地里反对而骨子里无法舍弃的心理补偿。再比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在书写世人对一个没落读书人的百般讥嘲的同时,也暗透着对“失语”者凄惨命运的无限悲怜,孔乙己的遭遇事实上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所有知识分子的遭遇,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看作是鲁迅对传统生命方式所吟诵出的一曲挽歌。鲁迅的文学世界是丰富的,鲁迅的思想是复杂和深刻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紧张关系也是促成其丰富文学世界和深刻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仅仅从追求现代化的现代性角度来思考鲁迅,研究鲁迅,很可能造成对鲁迅文学思想和艺术世界的丰富复杂的某种遮蔽。再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旧体诗的创作是很有市场的,不少现代作家都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歌,但人们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却漠视它的存在事实,看轻它的文学价值。将现代汉语诗歌命名为“新”的诗歌,将现代时期创作的古典诗词命名为“旧”体诗,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就含有重前者轻后者的价值判断在里头。梁实秋说:“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西可辩。”^①可见,对不同的诗歌类别用“新”与“旧”来称谓并不一定切合文学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此,要想对上述作家和现象作出更加准确的把握,我们有必要调整我们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并以此为基点重构现代文学史。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考察,应该立足于当今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全面观照构成现代文学的各种因素和各个方面,才能获得一个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准确认识,才能作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

①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